

范烟桥·丁谛·张爱玲

——“同学少年都不贱”的三种诠释

王羽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摘要]三位分属于不同文学阵营又都和海派文学有着紧密联系的现代作家范烟桥、丁谛和张爱玲,在不同时期分别以《同学少年都不贱》、《旧雨》和同题的《同学少年都不贱》,都以杜甫的名诗“同学少年多不贱”为主题,展开了形态各异的三种诠释方式。这种或不约而同或有意为之的文学活动,无形中将三位作家及其所代表的文学身份与气质进行了十分巧妙的并置,从而在一个参照点上凸现了他们迥异的文学品位和精神内核。

[关键词] 范烟桥;丁谛;张爱玲;鸳鸯蝴蝶派;海派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7)03-0100-(05)

1894年7月3日,江苏同里漆字圩范家埭的一户书香门第诞生了一个男孩,名镛,乳名爱莲,字味韶。在他日后延续了73年的生命中,他别署过含凉生、鸱夷、万年桥、西灶、乔木、愁城侠客等各种文名,但他最为人知的称号还是由南宋词人姜夔《过垂虹》诗中“回首烟波十四桥”一句而来的“范烟桥”。少年时代,他的人生轨迹就是辗转于苏、杭、宁之间,读书就学,求知上进,此外,便在家藏浩瀚的古籍书卷中流连忘返。作为北宋范仲淹从侄范纯懿之后,家学渊源,加上资质癖好,文学的因缘已深植于心。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他没有随当时就读的南京民国大学迁往上海,而是回乡向表舅钱祖翼学习书法,自此结束了学生时代。1914年他到吴江八坼第一小学任教,开始职业生涯。这一年在江苏镇江,一个名叫吴鼎第字调公的人出生,他的生命一直延续至2000年5月,他既是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被誉为“新文艺小说圣手”^[1]的丁谛,也是解放后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吴调公。

丁谛自然是范烟桥的晚辈,他初降人世的时候,范前辈早已步入文坛,先是模仿南社,在家乡同里发起“同南社”;其后,年仅18岁时由柳亚子介绍加入

南社,入社号为第969号。此外,他还历任八坼乡学务委员、吴江县劝学所劝学员、吴江县第二高等小学历史教员、第一女子小学国文教员等职,同时向包天笑主编的上海《时报》副刊《余兴》和王西神主编的《小说月报》投稿,初获成功。1920年9月30日,上海苏州河畔,又一颗终生与文学偕青偕老的种子破土而出,她就是日后文学声望更在他们之上的张爱玲。

1921年,范烟桥告别了小学教员的生活,办起了《吴江报》,历时五年,共出231期。1922年随家迁居苏州,与赵眠云等人组织了文学团体“星社”。在苏期间,他与苏、沪、锡报界文人密切交往,并为许多报刊杂志创作短篇小说、随笔、弹词等。1926年北上济南助编《新鲁日报》副刊《新语》。1927年回苏州,其间断断续续耗时三年完成了20余万字的《中国小说史》,当年由苏州秋叶社出版,为他带来广泛声誉。从1928年春天起他又重执教鞭,直至1932年在东吴大学讲授小说课程。就这样,他在教师、报人、文人等数种角色中穿梭往来,乐此不疲。到丁谛开始步入文坛的1933年,他已经是“鸳鸯蝴蝶派”的老干将了。

1933年,张爱玲在上海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读

[收稿日期] 2006-06-13

[作者简介] 王羽(1978-),女,天津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海派文学研究。

最后一年初中。这年她继处女作《不幸的她》之后，又在校刊《风藻》上发表了一篇既像散文又像小说的千字文章《迟暮》，以第三人称描写了一个孤独的女人，在花事缤纷的春日，独自凭栏远眺，想起曾经壮怀激烈的往事，垂头感叹如今的自己已经被时代抛弃，双手空空，一无所获，只剩毫无意义的自伤自悼。她为自己并不衰老的生命得出“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2]的结论，其中营造的悲凉气息令人辗转难忘。全文既沾染着新文艺的感伤情调，又酷似一首宋词的白话阐释，尤其是运用了柳絮、蝴蝶、青灯等一系列古典诗歌常见的意象，可以看出她在文学起步期对中国传统文人精致哀艳的文学情调的缠绵不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刚由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丁谛，先后在镇江一家商号任文书，在镇江师范学校任教，同时创作小说、散文，成果颇丰。而范烟桥继续编报、讲课、写作，还与影剧界接触，写起了电影剧本。年轻的张爱玲则只身南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读书。她的理想本来是继续出国深造，但1941年12月突起的太平洋战争又把她送回原地，无祖产可吃，又别无所长，只好卖文为生。于是在上海非常时期的文学园地上，这三位不同时空中的作家，终于以文章相遇了。

至少在《万象》、《紫罗兰》等刊物上，他们是旗鼓相当的作者，同样受到编者的推介和读者的欢迎。把他们三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更在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秋兴》八首第三首中的一句感叹：“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1943年10月1日出版的《大众》杂志上发表了丁谛的一篇近万字的小小说《旧雨》。在每期例行的“编后小记”中，编者特别强调：“丁谛先生不为出岫之云，重作在山之水，经本刊敦促再四，始以短篇小说《旧雨》付邮，并允长期撰稿，欣慰何既！”^[3]这是丁谛在《大众》杂志上亮相的第五个作品，^①在这一期的目录中还被给予题目和作者姓名黑体印刷的特别待遇，足见编者的推赏之意。

小说围绕着一个落魄的大学毕业生和一场“别开生面”的同学聚会展开情节。华民大学昔日的优等生殷澄波，在失业一年后接到同学会的请柬。他虽然已面临生计威胁，而同学旧友中又不乏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但他仍不愿向他们低首乞怜。无奈当年贵为校花，广为青年才俊追求却凭着理想主义誓嫁才子的殷太太，则坚持要他抓住这个机会，为生活窘境打开局面。于是在一个像是故意同没有雨衣的殷澄波作对的雨天里，他通体寒酸地来到会场。

旧时常缴白卷或惯于作弊的问题学生，纷纷亮出殷实的财力，使他备感焦虑，又要强装自尊。接下来，校长教授悉数登场，曾经为了他优异的成绩而对他青眼有加，此时却视而不见，反向那些发财的经理董事们大献殷勤。更可气的是，原指望当年经常劳他捉刀的好友陈中浩主动提出为他谋差事，不料这位煤球厂的大经理忙着联络众人为母校捐款，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好不容易问起他的生活境况，而敏感的他又觉得对方是在对当年与他同时追求校花落败的心理报复，他违心地拒绝了对方稍露端倪的诚意。小说的高潮出现在最后一段，殷太太对他谋职失败十分气恼，愤而带着女儿到永安公司闲逛。不谙世事的孩子看中了价格不菲的玩具，正在纠缠中，带儿子前来购买玩具的陈中浩出现在面前，殷太太虽然羞惭，却也再次拜托他为丈夫谋职。紧接着出场的陈太太更令殷太太倍感难堪，原来那正是大学时代一个极为恶俗的女同学。当她带着陈中浩为她女儿买的玩具回家，殷澄波得知真相并获知可以到陈中浩那里就职的消息时，他的心理也失衡到了极点。

应该说，这篇小说写得张弛有度，场景设置独具匠心，回忆与现实的交融、对比、反差，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对人物的讽刺、夸张和深彻的剖析同情，都十分到位，堪称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中篇佳作。

小说将杜甫的诗句作为前引，对全篇情节和基调进行统领，而题名“旧雨”，同样来自杜甫的《秋述》诗前小序，“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意思是，旧时受到唐玄宗赏识，于是宾客盈门，遇雨亦来，而今出仕无望，且生计艰困，旧友们遇雨不至，其中蕴含着他对朋友功利世故、初亲后疏的惆怅感受。自此，“旧雨”就成了“老朋友”的代称。显然，丁谛用这一题和这一诗，是深有讲究并两相吻合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丁谛引用的是杜甫的原诗，而且也点明了“杜甫”的名字，却把原诗“同学少年多不贱”中的“多”误作了“都”，似乎难以找出什么特别的原因。

丁谛是《大众》杂志上十分活跃的作家，包括这篇《旧雨》在内，前后共奉献了19篇作品，^②而且常常是和予且、谭惟翰等并列在目录的前几位，显得声势浩大，俨然形成了一个代表文坛新势力的群体。

《大众》第2号“编后小记”中说：“文艺无分野，在中国，文艺向有新旧之分，这实在是一个极古怪的现象，也是一个极恶劣的现象。在这本《大众》里面，新旧两派，可谓已经打成一片，虽在目录里面，也

看不出一点痕迹。作家如包天笑,潘予且,钱公侠,卢焚,姚克,徐卓呆,张恨水等等,排在一起,我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刺眼的地方,我们只希望他们互相研讨,创出伟大的作品来。”^[4]

这番话虽然寥寥几句,却说得意味深长。尽管《大众》的编者并不希望所谓的“新旧两派”作家形成壁垒森严的界限,因而从编辑刊物的角度上尽量将他们融为一体,但新旧的存在终归是事实。这里罗列出来的“旧派”作家,其实也就是“鸳鸯蝴蝶派”文人,而“新派”则是指新涌现出来的一批年轻作家。这一新一旧两派文人能亮相于同一个杂志,本身就说明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更能昭示出他们根本上的差异。

在《大众》上,作为旧派文人一员的范烟桥也贡献颇多,从1943年12月号的《没遮拦》到1945年7月号的《教授国文的经验》,13期上都有他的大名,^③而且有几次还是与丁谛同期献艺。不过他们两人最大的交汇点却是在另一个“鸳鸯蝴蝶派”刊物《紫罗兰》诞生以后才出现。

1944年11月出版的《紫罗兰》第17期上发表了范烟桥的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题目显然也是由杜甫的诗句而来,不知是否受到丁谛前作的影响。这篇小说和《旧雨》比起来,无论在情节技巧、思想立意方面都较为薄弱。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真理中学毕业的程子范博士,中心情节是一场同学聚会的结婚典礼。程博士下课回来,接到一位中学同学的结婚请柬,于是与太太谈论起来。这位同窗原本和程博士一同在东方大学教书,刚刚改进大通银行做人事科长,攀上了大通银行董事长做丈人,一下子就“脱贫致富”了。相形之下,程博士辛苦半月只赚来两斗米的薪金,一时颇多感慨。四天后,他赶去道贺,与其他有头衔、当老板的各位旧同学一一见面,虽说心里掀起一些波澜,但仍然对自己寒酸的教职感到心安理得。结尾一段写道:

但是他回味到各个老同学的谈吐,各个老同学的处境,觉得老杜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有着无限感触。他把自己和他们比较一下,反而心安理得,以为这大学教授的生涯,于他没有什么不满足,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决不希望什么“五陵裘马自轻肥”了。^[5]

显然作者并没有意识到引用的这句诗有一字之误。由此推断,范烟桥很可能是受了丁谛前作的误导。《大众》和《紫罗兰》同为“鸳鸯蝴蝶派”20世纪40年代有广泛影响的代表刊物,范烟桥也许就是读了他的《旧雨》而萌发了写作这篇小说的灵感,同时

也引用了丁谛用错的杜甫诗句。

顺便指出,除去此篇以外,范烟桥还有五篇作品^④贡献给《紫罗兰》,但《同学少年都不贱》应算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篇。丁谛和张爱玲也颇有作为。丁谛发表了《我们的利市》(创刊号,1943年4月1日)和《东山再起》(第9期,1943年12月);而张爱玲的大作就更来头不小,众所周知,当年她叩响上海文坛大门的两记重磅炸弹《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就是亮相在这里的第2期直至第6期。张爱玲肯定也是关注《紫罗兰》的。

再说另一篇同题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又要把时间推到20世纪90年代了。

1997年10月,为纪念张爱玲逝世两周年,美国南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举办了“张爱玲遗作手稿特展”。持有张爱玲著作版权的台湾皇冠出版社为这次“特展”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张爱玲手稿复印件,包括《对照记》、《乱世纪二三事》(即《惘然记》)、《“嘎?”?》、《草炉饼》、《笑纹》、《一九八八至——?》、《四十而不惑》等,以及英译《海上花列传》、英文《少帅传奇》的打字稿。也就是在此次展出中,张爱玲一部大约作于1973年至1978年间的中篇小说惊现于世,这便是《同学少年都不贱》。2004年初,台湾和大陆相继推出了繁体字本和简体字本,使这颗沧海遗珠终就其位。^[6]

20世纪70年代,丁谛早已变身为吴调公,范烟桥已于1967年3月28日在苏州寓所病逝,张爱玲也已进入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在洛杉矶的隐世生活,虽然仍坚持写作,却不可与她青年时代的挥洒自如相提并论。因此,她这篇《同学少年都不贱》倒像是为一个远逝的时代里的人们送行的压轴之作。

小说的核心内容仍是同学今昔的强烈对比,但张爱玲选取了大跨度的时空关系,使小说的容量和气韵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深广与成熟。

赵珏和恩娟原是上海一所教会女中的同学,关系紧密而微妙,但也有相当的感情。中学毕业后,赵珏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单过,大学没毕业就被断绝了经济援助,被迫在京沪间跑起了单帮。恩娟则一帆风顺读大学,后来嫁给了犹太人汴·李外,去了内地。战后,恩娟一家回到上海,旧友重逢。一个是相夫教子的阔太太,一个却是无依无靠的“没女”,彼此对对方的生活方式都存在根本的抵触情绪,昔日的情谊已近乎乌有。解放后,赵珏写信和早已定居美国的恩娟联系,却只得到保持距离式的答复,于是两人同在美国,却十几年不通音信。赵珏面临婚变,又想到托恩娟找工作,才重新见面,然而此时的恩娟

已然成为政府要员太太,跻身美国上流社会,对于要靠卑微的传译员散工来维持生计的赵珏,完全是一种高高在上、敬而远之的态度。赵珏一方面感叹恩娟这一生的无得自由舒展,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巨大失落。

张爱玲关注同学旧友在不同的命运铺展中产生的心理逆差,可是由来已久的。她那篇惊世的处女作《不幸的她》,^[7]作时年仅12岁,尚为圣玛利亚女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小说描写年轻、孤傲的“她”少年丧父,只得与母亲离乡投亲。21岁时因不满母亲的草率指婚,愤而出走。在外飘泊数年后,得知母亲已经去世,为排遣心中的失意与落寞,应邀到故乡的童年好友雍姊家作客。雍姊有夫有女,在海滨快乐地生活。虽然“她”获得了这一家人“和蔼的招待”,却因“我不忍看了你的快乐,更形成了我的凄清”很快就不辞而别。“她”与雍姊从小就是一对密友,“她”的命运坎坷多难,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背亲远走,最终落得形单影只,心底积淀的苦痛可想而知;相形之下,雍姊就显得平稳安定,还由自由恋爱结婚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她”既不满命运的安排,又无法直接倾诉自己对好友的羡慕和由此带来的心理障碍,所以雍姊一家对“她”越好,“她”越不能承受,最后只能逃走。张爱玲以12岁的年纪,塑造出这样经历丰富、心理曲折的女性形象,实在令人惊叹。拿这篇少作与40多年后诞生的《同学少年都不贱》相对照,可以发现作品的母题何其相似,结构也基本吻合,尤其是女主人公那种对比失落之下反而更加强烈的自尊心,也惊人地如出一辙。难道张爱玲一辈子都在咀嚼着“她”和“赵珏”的痛苦吗——从少年到几近老年,从上海到洛杉矶,从繁华末世到异地孤灯?

将三篇在主题上至少貌为相似的小说放在一起分析,可以发现,它们虽然都打着“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旗号,但其后长短不一的队列中喊出的口号却决然不同。范烟桥的《同学少年都不贱》虽然铺陈了较为寒酸的程教授与各种旧同学之间财力、势力上的落差,但无论是以婚姻做纽带积极向上攀爬的新郎长康、名片上头衔成堆的金初我,还是靠囤积棺材发财的小开张上达、混迹于高官显贵之中不顾廉耻的交际花高华英,其实都无法令安然于温饱生活的程教授产生丝毫艳羡之意,相反,他在观赏了众同学之“丑”后,依然对自己的高尚选择傲然坚守。这种隐含的褒贬评价也正是作者通过这篇作品要向读者传达的核心精神,孰“贱”孰“不贱”实际上等同了一种精神境界高低的尺度。

实际上,道德训诫与人生指南一直是“鸳鸯蝴蝶派”的拿手戏。如1915年出版的《小说大观》第1集例言中即申明:“所载小说,均选择精严、宗旨纯正、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之作、无时下浮薄狂荡海盗导淫之风,”^[8]显然十分推崇小说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负载意义。再如《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在17期《写在紫罗兰前头》里的一段话:

吴葶女士的《海恋者》,写海滨一段三角恋爱的故事,那女主人公处于两位恋人之间,偏偏是五雀六燕,铢锱悉称;她在不知道该怎样取舍的心境之下,却被一位老教授劝她为社会服务的一封信所感动,竟同时抛下了两位恋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为了自己,为了他们,为了最崇高最神圣最有价值的爱,我不得不这么做!”这是何等伟大的呼声,也可为一般沉迷于恋爱圈中的女性们说教的。范烟桥先生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写一位大学教授在他同学的结婚礼堂上,遇见他中学时代的许多男女同学,当初大家做中学生时,本来是同在一个范畴里的,而经过了社会洪炉的陶冶,却变做了各种不同型的人物;以致使这位大学教授起了无限感触,不免引用起老杜这一句有名的诗句来。其实我们班进过学校的人,到了中年而仍然郁郁不得志的,遇见了同学少年,又那得不感慨系之呢?戴容女士的《入赘》,是一篇中篇创作,本期先登一半,下期续完,写一个穷小子迷恋虚荣,抛撇了真心爱他的人,入赘富家,以致受尽了侮辱,无可告喻;凡是拜金主义者读了这故事,不啻当头棒喝。^[9]

这里周瘦鹃介绍了当期的三篇小说,他对《同学少年都不贱》的解读主要是从“感慨”这个角度去进行的,而对前后两篇女作家的作品则都突出了小说文本对人的警示和指导作用。同样类型的评论充斥在《紫罗兰》之中,这集中体现了“鸳鸯蝴蝶派”根本的精神指向。

丁谛的《旧雨》则比上篇的戏剧冲突和讽刺力度都大得多。程教授尚能以半月教职挣到两斗多米的薪水,尽管遭遇夫人冷淡的苦笑,却毕竟还算养家糊口不愁。但《旧雨》里的殷澄波已面临山穷水尽的境遇,失业一年,毫无起色,自然时常遭到太太的冷嘲热讽,他也不甘示弱,以精神贵族自居,并对太太专注于物质大加鞭笞。显然,他和程教授的淡泊自守截然不同,他渴望通过同学的关系找到工作,他在强大的压力下表现出来的愤世嫉俗的假相,也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脆弱的自尊心,他骨子里热切盼望改变目下的窘境,只是出于昔日的心理强势,很难接受旧友的帮助。

上海文学从业者在抗战爆发后的尴尬处境,由1939年4月17日出版的《上海生活》第4期上发表的署名“九君”的《上海五种畸形家庭》,大可尽得其详。文中写到的第五种就是“文丐家庭”:

文丐清贫,赁住亭子间,阁楼,灶披,斗方一室,饮食于斯!工作排泄亦在斯!板床一张,木桌一只,破椅数事而外,即无长物,文丐夫人,十九黄脸婆也!但在良人眼里,视作“西施”,行文描写,尽极礼赞,肉麻勿觉呢?落魄文丐,蜷伏此种家庭,生活可怜,不难想像,呜呼文丐之家!^[10]

这段描写也许不乏言过其实之处,但大体情况应相差不远。骂着妻子“我想不到一个崇高纯洁的灵魂竟会变成如此庸俗卑鄙”的殷澄波,也一样在同学会上期待着“陈中浩能自告奋勇地代他设法便好了”,他秉承的并不是口口声声叫嚣的“精神的崇高”,而是在社会上立足的无能为力之下卑微的心理“防线”。

在真真切切面临生存困境时,具有鲜明的20世纪40年代海派通俗小说家身份的丁谛,敏锐地发现了人的务实性和虚伪性,在强烈的现代都市氛围和浓厚的市民情趣中,实现着决不高蹈的日常生活目标,这似乎更能代表20世纪40年代海派文学的精神内核。

张爱玲自然是“新海派”的代表人物,^[11,12]但她的横空出世与顽强延伸的文学生命力,超越了她幼年喜读的“鸳鸯蝴蝶派”,也显著提升了海派通俗小说的艺术品质和思想内涵。她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凸现出来的不是道德节操在人身上的自觉贯彻,也不是时代环境对人的无情挤压和扭曲,而是人自主选择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变化。赵珏和恩娟的命运变迁,来源于各自的人生取舍。从本质上说,前者执着于爱,后者追求了生活。

赵珏,也许正是张爱玲自己的化身吧。

如果说范烟桥、丁谛都是处于潮流、群体中应时即景创作出各自的作品的话,那么张爱玲是真正隔开时空的渺远里程,以生命的真粹来记录人生的苍悲和命运的诡谲。这三位作家正好代表了三个时代、三种作家的类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同学少年都不贱”作为阐释自身人世经验的载体,其意义本身就是不可估量、值得深思的。至于谁受到谁的影响、启发,倒并不十分重要。作为更遥远的时代中的文学大师,杜甫如果亲眼目睹后来同业者的“壮举”,应当是最感欣幸的。

[参考文献]

- [1] 编后小记[J]. 大众,1944(4):195.
- [2]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第4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2.
- [3] 编后小记[J]. 大众,1943(10):195.
- [4] 编后小记[J]. 大众,1942(2):223.
- [5] 范烟桥. 同学少年都不贱[J]. 紫罗兰,1944(11):71.
- [6] 陈子善. 序[M]//张爱玲. 同学少年都不贱.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4.
- [7] 陈子善. 天才的起步——略谈张爱玲的处女作《不幸的她》[M]//于青. 寻找张爱玲.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19-23.
- [8] 例言. 小说大观:第1集,1915[M]//芮和师,等.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12.
- [9] 周瘦鹃. 写在紫罗兰前头[J]. 紫罗兰,1944(11):1.
- [10] 九君. 上海五种畸形家庭[J]. 上海生活,1939(4):59.
- [11] 王晓初. 论“新海派”作家群的小说创作[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9):102-106.
- [12] 余贞. 论“新海派”作家群对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影响[J].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122-124.

注释:

- ① 之前发表的作品有《献米》(1943年1月号,1943年1月1日),《比邻》(1943年2月号,1943年2月1日),《三月的插曲》(1943年3月号,1943年3月1日),《由〈结婚集〉论家庭》(1943年4月号,1943年4月1日)。
- ② 另有:《笼中鸟》(1943年11月号),《腊八粥》(1943年12月号),《春灯》(1944年2月号),《修褙》(1944年3月号),《免费旅行》(1944年4月号),《婚姻悲喜剧》(1944年5月号),《野性的复活》(1944年7月号),《叮咛》(1944年8月号),《小学校长》(1944年9月号至1944年10月号),《笑与泪》(1944年10月号),《变》(1944年12月号),《新年偶忆》(1945年1月号),《身价》(1945年2月号),《彩排》(1945年5月号)。
- ③ 除文中提到的两篇之外,还有《没遮拦》(1944年1月号),《林译小说论》(1944年8月号),《治学卮言》(1944年9月号),《论“三言”》(1944年10月号),《寄琐散叶》(1944年10月号,1944年11月号,1944年12月号,1945年1月号,1945年2月号,1945年3、4月合号,1945年6月号),《张嘉祥别记》(1945年5月号),《教授国文的经验》(1945年7月号)。
- ④ 《马将篇》(创刊号,1943年4月1日),《述怀诗自笺》(第7期,1943年10月),《感逝》(第9期,1943年12月),《主办与轿盘头》(第15期,1944年8月),《垂虹桥》(第16期,1944年9月)。

[责任编辑:夏畅兰]